

ZHONG GUO LIDAI WAIJIAO JIA

中国历代 外交家

何茂春 ● 师晓霞 ●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 ●

中国历代外交家

何茂春 师晓霞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责任编辑: 张新安 王长江
封面设计: 白长江

中国历代外交家

何茂春 师晓霞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欣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68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000

ISBN 7-5017-1232-8/K·14

定价: 8.00 元

本书献给历史上为沟通中外联系,为维护国家权益而献身外交事业的人们;献给关心此书及作者的友人。

何茂春 师晓霞

前 言

《中国历代外交家》是我们在写《中国外交通史》上卷期间收集资料，在《通史》写完以后整理而成的。其中介绍了数十位中国历史上能言巧辩、不辱君命、不辞劳苦的使臣或在某一阶段外交斗争中发挥了一些重要作用的人士或对外交策略、邦交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上至纵横家始祖周朝吕尚，下止中华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史学界近年来有不少专门史的通史著作问世，如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货币史、间谍史、宦官太监史、娼妓史、建筑史、宗教史、科技史等等，相应也有专门史的历史人物传记。我们用了十二年所写的第一本外交通史也可望于近期内向读者交卷，篇幅所限，我们在通史的历代外交官列传中只能简要介绍一些他们的主要业绩，而这本书我们列出了更多的人物并用尽可能多的史料更生动地反映他们的人生——甘苦、荣辱、悲欢、生死。我们不仅写“正面人物”，即被道德家们叫好的人物，也写有争议的人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主管外事或出使异国异邦的人物有数万之众，很难说本书中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性，困难在于作者的学识和资料都是有限的。

说起外交家，先当谈谈“外交”的概念。

“外交”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甚至

是滥用,如“企业外交(企业公关)”、“家庭外交(邻里关系)”等。

狭义上的“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并对他国对外政策或国家集团的联合对外政策作出反应的和平的对外活动,包括制定外交政策和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政治活动,如政府间不同级别的互访、谈判、结盟、缔约、调解、斡旋、召开或出席国际会议及一般的使节领事活动等。

此处不妨引用国内外其他一些权威定义:

已故的前苏联外交家兼外交理论家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辞典》是这样说的:“为完成国家的对外政策任务而由政府机关(外交主管机关,往往是政府首脑的国家元首)及其在国外的代表执行的一种事务性的、和平的、不同于军事的业务工作。”另一苏联学者B·波将金主编的《外交史》上有这样一段话:“外交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质取决于不同经济形态所固有的不同社会关系,而首先取决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西方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解释是牛津英文词典中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atow)在他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中开篇定义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我国《辞海》中的解释是:“外交——国家为实行其对

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本书认为，各种定义都有共同点，不同之处可以互相补充。欧美各国“外交”一词均源自古希腊语“διπλωμα”，罗马语拼为“diploma”，本意为“折叠”。古罗马帝国的道路上所用的一切护照、通行证和旅客单都刻在两张金属片上，用一定方式折缝在一起。这些金属通行证被称为“diplomas”（文凭）。后来这个词就延用到官方文件，特别是外交文件上。以致于到了17世纪，这个词就有整理、训古、编类、档案、文凭等含义。今天英文毕业文凭称“graduation diploma”就是引申义之一。18世纪后期，英语中的“diplomacy”就有了“外交”的含义。现代欧洲语言“外交”一词只有拼写上细微的区别，如：diplomatie（德语、法语），diplomacia（西语），diplomzia（意语），Дипломатия（俄语）……。总的来看，欧美语言diplomacy一词是由“凭证，信物”引申出“外交”含义的。

有趣的是，中国的“使节”一词开始也是由“旌节”（一种带纓长杖）引申而来的，这里的“节”就是用金、银、铜锻造的符信之物。古代中国“使”和“节”是不可分的，苏武被扣匈奴而天天捧着汉武帝给他的旌节（外交信物），汉语因而产生了一批新词汇：不失节、节气、节操、高风亮节、晚节等。中国人把使节忠于皇帝看待象妇人忠于丈夫一样重要，因此形成了“贞节”一词，寡妇不嫁被称为“守节”、“节妇”。

中国古代就有“外交”一词，但其意义与今之外交也完全不同。古词“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谷梁传》隐公元年记：“寰内诸侯，非有天子（周王）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寰内，指天子畿内之大夫采邑。诸侯在畿外独立为政，对天子有朝贡义务，天子直属之臣民不许“外交”，即不得私自去见外地诸侯。《礼记第十一·郊特牲》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二君也。”就是说，不管是周室亲臣还是诸侯下属，都不能在奉命往聘“外国”时，以私人的名义进见外君，否则，就是有了二心。小说《红楼梦》中贾府被抄，罪名之一就是身为京官的贾赦外交地方州官。可见，古语“外交”一词与今之外交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史记·邓通传》说，邓通“不好外交”，指他不好交际，深居简出。

古语“外交”虽没有外交的主要含义，但不等于古代没有外交活动。中国最早的外交活动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国家政权的出现，外交就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交也就同历史一样向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

中国学者骆宾基经过长期潜心研究金文，证明了中国上古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炎黄五帝时期^①。这样，夏朝以前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再只是传说中的史前时代。这一惊人的发现也为追寻中国上古外交活动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原始社会后期各部落之间除战争以外的高级接触，

^①《光明日报》，1987年8月31日。

即为外交的萌芽。几个部落如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往往通过谈判结成部落联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最典型的就是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联盟伐蚩尤。部落的联盟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夏朝就是在“万国”（众多部落）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奴隶主贵族统治政权。但是夏朝并不是华夏族唯一的中央政权，与夏并立的有许多方国（或残存的其他原始氏族部落）。古今中外，国家从来没有孤立地存在于世上。多国并立，不是兼并，就是共处。兼并意味战争，共处意味着要和平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会有外交斗争和一般外交活动。可以这么说，外交同人类文明历史一样悠久。中国的外交远不止近代中外官方关系的建立，古代没有主权国家的概念，但不等于说古代就没有外交，即使到了近代，外交也不完全是主权国家的事务。半殖民地、半主权、被保护国也有它们的外交。只能说不同历史时代的外交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之间也有极其活跃的外交活动并形成了古老的外交制度而影响至今。1861年以前仍处在分裂中的意大利，以及以1871年统一前的德意志，各割据政权也有十分复杂的外交斗争。现代外交一词与近代西方出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权(Sovereignty)”等概念紧密相连，中国接受这些概念要晚（十九世纪中后期），而中国的外交原则、外交策略、外交思想及外交惯例很多是古代外交经验的遗传和沿革。因此，研究中国外交，不得不从上古时代的外交开始。

既然很早就有了外交，而古汉语“外交”又不表示外交，那么，古时用什么字词来表示外交呢？古汉语词汇亦

很丰富，自然不会没有表示外交的词，例：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交相利。”（墨子语）

“遣使交通诸侯。”（《史记》）

“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左传》）

“文德以来之。”（孔子语）

“（辛子）与秦交而舍，使者数相往来。”（《战国策》）

“次伐交。”（《孙子兵法》）

“始乃一通焉。”（范晔语）

由此可见，古代汉语表示外交的词有：来、往、结、交、通、来往、往来，等等。

战国时含有外交意义的词还有：连、横、纵等，战国百家中纵横家，外交家是也。

汉朝以后，东方外交总的格局是以中国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为宗主的宗藩体系，所以朝贡、招谕、来朝、交远、柔远等等都有外交的含义。

古代表示外交的常用词是“邦交”，《周礼》说：大行人（主管外交的官员之一）“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①今人也把外交称“外事”，而这个词已经用了数千年。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难看懂的史书——《尚书》上就有“外事”一词。其《康诰》篇载曰：“（王语）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位。”战国时，

①《周礼今注今译》，林尹注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402页。后文同。

纵横家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①三国时孙策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当今读书人都很熟悉了。

中国从秦汉时代到19世纪早期，一直不失为东亚头号封建帝国的强权地位。“宗主”当久了，封建统治者就自满起来，不想平等地与外国交往。到清朝灭亡时，仍然避免使用“邦交”、“外事”、“外交”这类古词，而用“夷务”、“制夷”、“洋务”、“夷事”等含有妄自尊大意义的词表示外交。只是八国联军侵占京师之后，清朝才正式用“外务”一词，并依照万国律例建立了“外务部”。

中华民国时代，“外交”一词才得到广泛运用，直到今天。汉语中“外交”一词的最近义词是“邦交”，如：“中韩两国邦交正常化。”

本书写的是历史上的外交官的外交家。我们在写《中国外交通史》下卷时还注意收集了有关新中国外交家的事迹，不久将开始编撰《新中国外交家》。

敬望专家和读者对本书提出修正意见。

^①《韩非子·五蠹》，此为该书作者引纵横家语。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论继承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邦交理论遗产	(1)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发展沿革的基本 线索	(2)
二、先秦邦交理论举隅	(6)
三、继承历史遗产和借鉴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	(27)
第二章 中国历代外交官制考略	(29)
一、夏、商时期外事制度	(29)
二、周朝的宗藩制度和外交礼制	(30)
三、春秋时代列国外事制度	(34)
四、战国时期各大国的外事官职	(35)
五、秦朝外交制度	(36)
六、汉朝外交制度和外交机关	(38)
七、魏晋南北朝外事体制	(42)
八、隋朝外交机关	(43)
九、唐朝宗藩制度、外贸、外交机构及边境特区的外事 职能	(45)
十、辽、宋时期外事制度	(48)
十一、元朝外交职官	(54)
十二、明朝外交体制	(57)
十三、前清外交制度	(61)
十四、后清外交机关的演变	(63)
十五、中华民国外交官制	(74)
第三章 先秦纵横家	(76)
一、纵横家始祖吕尚	(76)
二、“九合诸侯”的齐国宰相管仲	(80)

三、巧辩大师晏婴	(83)
四、孔子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	(86)
五、利口巧辞变五国的子贡	(90)
六、“弭兵”运动倡导者华元、向戌	(97)
七、“古之遗爱”子产	(99)
八、善用比喻的申叔、宫之奇	(103)
九、“一言千钧重”的王孙满、烛之武	(104)
十、“权变大士”张仪	(106)
十一、身佩六国相印的纵约长苏秦	(110)
十二、有勇有谋的蔺相如	(113)
十三、危难中挺身自荐的毛遂	(115)
十四、“朝秦暮楚”的“恣臣”公孙衍、陈轸	(116)
十五、善用“远交近攻”的谋略家范雎	(117)
第四章 汉朝至明朝外交家	(120)
一、勇开中西交通的张骞	(120)
二、宁死不屈的苏武、终军	(123)
三、智勇双全的东汉定远侯班超	(126)
四、诸葛亮的均势外交和驳辩术	(127)
五、唐朝外交家崔敦礼、王玄策	(131)
六、明朝外交家赵秩、侯显、陈诚	(134)
七、伟大的探险家、外交家郑和	(136)
第五章 后清外交家	(141)
一、后清第一位夷务大员林则徐	(141)
二、近代外交的奠基人恭亲王奕訢	(142)
三、功过参半的李鸿章	(149)
四、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	(162)
五、虎口夺食的曾纪泽	(165)
六、不可多得的使才薛福成	(168)
七、至死不屈服沙俄淫威的杨儒	(171)
八、状员公使洪钧和他的随妾彩云	(173)

九、含冤屈死的许景澄	(177)
十、诗人外交家黄遵宪	(182)
第六章 中华民国外交名人	(190)
一、唐绍仪	(190)
二、汪大燮	(196)
三、陆征祥	(201)
四、孙宝琦	(208)
五、颜惠庆	(210)
六、伍廷芳	(223)
七、王宠惠	(227)
八、郭泰祺	(237)
九、王正廷	(241)
十、顾维钧	(250)
附录一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262)
附录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277)

第一章 论继承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邦交理论遗产

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并非新的课题。西人研究国际政治,或称国际政治关系,并未忽略东方古代邦交理论以及远东悠久的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宗藩国家体系。行为主义理论学派的“系统模型”专家霍尔斯蒂撰写他的《国际政治——分析结构》就是从中国周朝时的“国际关系”模型启笔的。据说亨利·基辛格不但借鉴了奥国梅特涅、德国俾斯麦等人的外交权术,还从中国战国纵横家名著《鬼谷子》一书受到某些启示。许多当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论和传统的邦交思想都有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而当今中国史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对这一领域尚未深入进行研究。外国人对中国古人的研究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挑战,中国青年学人对此不能等闲视之。

借鉴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不只是一个文化上继承的纯学术问题,它对当今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历代政治家和外交家处理邦交事务的成败之因果,能使后人少遇弯路和挫折。所以,研究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既要借鉴外国的理论成果,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仅仅从当前外交构想和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摸石过河”的哲学来。再说,研究当代有诸多困难,我们只能先退几步,从过去入手,借古观今。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 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战争与邦交问题。古代有没有“国际关系”？答案是肯定的。古人说：“国于大地，必有与立。”意义有二：一是国家的建立不是孤立的，必然有别的国家同它一样建立起来；二指国家的存在必然是与别的国家共存于世。古代国家不同于今天的主权民族国家概念，但不能以此否定古代有国际关系。不同时期关于国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因而国际关系也各有特色。《史记》等书说黄帝能号令数百个诸侯国国主，显然那时的“国”就是氏族部落。夏、商两代与之并存的四外民族政权称“方国”，周朝时中原地区华夏族地区不叫国，而叫“天下”，周王即为“天下共主”，而那时的“国”多指是诸侯政权。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因此那时的诸侯符合近代国家三要素说。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由伟大的满族最终实现的，在此以前尽管有汉唐元三朝盛世，但也没有形成固定的版图和疆界。这种“国无常土，君无常民”的现象延续了几千年。且不说各民族之间时盟时战，就是在同一个民族内部也常常处于“分合无常”的割据分裂状态。例如华夏族在统一前就是“万国林立”的多极格局，汉朝以后有三国鼎立，唐朝灭亡后有五代十国。

古代东方的国际关系远不止中国域内同时并存的多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从汉朝开始，中国成为大东亚“汉文化圈”形式上的宗主，四邻小国与中国长期维持朝贡与封敕的关系。这种相对稳定和平的格局持续发展了二千多年，到西方向远东殖民入侵时才逐渐被打破。1895年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取朝鲜的宗主权和列宁在1921年支持蒙古的“独立”，才使这种松散“宗藩”体系彻底崩溃。从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都加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殖民体

系。

既然中国很早就有了并存的多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中国一直处在不同的国际关系中，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是如何看待国家间利益斗争的？这里先试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邦交思想作简要的概述：

1. 先秦时代。从金文甲骨文化到秦朝统一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学术民主时代。当时虽然有奴隶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封建礼规，但人的思想和学术著作却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学者仕人对任何事物可以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统一前的华夏族有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斗争，也有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的所谓“华夷之争”，长久的战争使人民不得休养生息，生产力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先哲们不得不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墨、道、儒、兵、法、纵横家等）在国家间关系的问题上各创一说，不能相一。总的来看，有两大思想主流，一是主张“和为贵”，恢复礼制，遵守为人人为国的道德准则。其代表人物有墨子、老子、孔子以及他们的门徒。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列国政治家和战略家，主张“农战”，用战争统一天下。他们认为人“生性好利”，国家亦然。各国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地扩充实力。荀子、韩非子的“人本恶”思想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论根据。孙子说国家“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点出了国际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利”字。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之争自古而生，不足为怪。甚至把炎黄结盟而伐蚩尤，灭蚩尤而交恶于阪泉作为“国无常友、亦无常敌”的最早例证。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还有管子、商子、吴子等。他们的观点多为诸侯国君所接受，因而这一派理论家为政率军者颇多。这一时期的纵横游说家尤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外交策略和艺术毫不比今人逊色。《鬼谷子》一书的捭阖十三术是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的系统总结。此外，中原诸侯称伯（同霸）者的“制夷”主张和“攘外”策略对后世影响颇大。

2. 秦汉至满清中国封建历代帝王作为远东列国“宗主”的邦交思想。历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都视自己为天下共主，希望“远近